



毛泽东的辩证唯物论的知行观

哲学与人生

在近代中国哲学史上，魏源、康有为、章太炎、孙中山等哲学家都讨论知行观，提出了“及之而后知”、“革命开民智”、“知难行易”等不同的观点。毛泽东在吸收近代哲学家关于知行关系的讨论成果的基础上，对近代以来的知行观作了一定程度的总结，并从实践的层面进一步讨论知行观，形成辩证唯物主义的知行合一观。

毛泽东对知行观的讨论是与他对中国革命实践的认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过程中，极力反对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作风。从认识论上看，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都违反了实践的观点，主观主义过分夸大了主观经验的作用，教条主义过分夸大了理论教条的作用，两者都没有正确认识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而且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造成极大的危害。他指出，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是科学的、正确的认识路线，可以较好地解决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理论错误。

“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的理论。”同时，他也批判形而上学唯物论的认识论错误，指出形而上学的唯物论的缺陷就在于没能真正把握实践与认识之间的内在关系。

“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对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





毛泽东对知行观的讨论突出以下几个主要观点。

第一，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在古代，“知”常被理解为德性之知，“行”常被理解为道德实践，毛泽东对知行含义的理解已经突破此局限，在更广的意义上把“知”理解为认识，把“行”理解为实践。毛泽东指出，实践首先是人类的生产活动，因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

毛泽东强调生产活动在实践中基础性地位，这和马克思强调生产劳动在历史实践中的首要性是一致的。以生产活动为首要形式的实践不仅是认识的来源和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决定着人类的其他活动。

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但不是唯一的或全部的形式。“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他的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总之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毛泽东的概括揭示实践形式的多样性，除了生产活动，实践还包括阶级斗争、科学艺术活动、教育活动、服务行业的活动等形式。其中最主要的三种形式是生产劳动、处理生产关系的活动（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对实践形式多样性的概括是与社会生活的丰富性相关的。现实生活对人而言是开放的，是多层面的，包括物质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等形式，如果把社会生活看成一个包含多种具体生动形式的整体，那么人类的实践也相应地涵盖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而且，随着社会分工的复杂化，实践的形式也将越趋多样化。

第二，知行的辩证关系表现为认识与实践的辩证发展过程。毛泽东从辩证法的角度审视知行关系，把知行关系理解为认识和实践的辩证关系，展开过一个辩证发展过程。毛泽东认为，基于实践的认识过程具有反复性，它是一种螺旋式上升的运动。认识运动总的秩序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认识的反复性不是指重复性，而是指在实践中获得感性认识，感性认识必须要上升到理性认识，然后再来指导实践。不过，这种从实践到认识，再从认识到实践的反复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受诸多客观因素的影响和限制的，因而其本身具有一定的复杂性。认识运动“不但常常受着科学条件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而且也受着客观过程的发展及其表现程度的限制（客观过程的方面及本质尚未充分暴露）”。

毛泽东认为，在人们通过实践获得理论后，需要用理论来指导实践。理论的指导过程就是使理论回到实践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错误、失败。





“许多时候须反复失败过多次，才能纠正错误的认识，才能到达于和客观过程的规律性相符合，因而才能够变主观的东西为客观的东西，即在实践中得到预想的结果。”认识运动的每一次反复，都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经过检验，“去伪存真”，不断使主观符合客观，使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真理一定是经过实践的检验而获得和证实的。此外，真理总是具有相对性，因为“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真理也具有绝对性，但绝对真理恰恰是在相对真理中得以展开的。真理不可能被穷尽，必须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毛泽东得出的结论是：真理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因此，对那些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必须要予以坚决反对。人们对于真理的认识是在认识与实践的辩证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得到深化和扩展。



第三，知行关系和群众观点是一致的。在毛泽东眼里，知行关系不仅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历史观的问题。毛泽东用唯物史观中的群众观点来理解知行关系，把知行关系和群众观点统一起来，实现了唯物论的知行观与历史观的统一。在认识论中，认识从实践中来，再回到实践中去，如此循环往复，用群众观点来理解，这个过程就表现为：从群众中来，再回到群众中去的过程。关于这两个过程的统一性，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说：“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人类智慧的源泉来自于群众的实践经验。不过，这些经验反映在具体的思想或言论中就常常表现诸多不同的意见。群众的意见呈现出多样性，往往分散而不成系统。这些意见必须经过筛选和鉴别，通过辩证综合以形成科学的理论后，才能用来指导革命实践。因为经过辩证综合形成的科学理论，具有了一定的系统性，能够更加完整、更加深刻地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

实践和认识的辩证运动与“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辩证运动是统一的，都是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群众掌握了科学的理论并将之运用于实践，就必然会在新的实践活动中创造出新的理论，这种新的理论必然再次回到实践中。从认识发展的方向上看，这种反复性的运动体现为从个别到一般，再从一般到个别，而这与群众路线也有内在的统一性。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换言之，“两个方法”既体现了认识的多样性，也体现了认识的统一性。

